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张莉 著

魅力所在

中国当代文学片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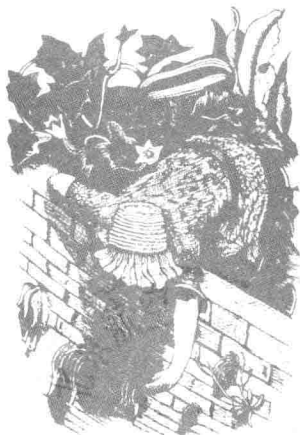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张莉 著

魅力所在

中国当代文学片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魅力所在: 中国当代文学片论 / 张莉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6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2344-4

I. ①魅…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3557 号

书 名: 魅力所在: 中国当代文学片论

著作责任者: 张 莉 著

责任编辑: 黄敏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344-4/I·261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0.25 印张 266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丛书主编 吴义勤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首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杨庆祥、霍俊明、梁鸿、李云雷、张莉、

周立民、房伟等7位优秀青年评论家成为首批客座研究员。

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批7位青年评论家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成长和进步非常迅速。借助客座研究员这个平台，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例会和学术会议，他们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重视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对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研究，有力地介入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对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70后、80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7位青年批评家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这套“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评论家丛书”，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

是为序。

吴义勤

2012年金秋于文学馆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3

文学叙事与文化语境

两个“福贵”的文学启示

——以赵树理《福贵》和余华《活着》为视点 3

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

——重读《爱，是不能忘记的》、《一个人的战争》、《我爱比尔》 16

在逃脱处落网

——论 70 后小说家的写作 30

一个作家的重生

——论萧红与中国当代文学 45

传媒意识形态与“世界文学”的想象

——以顾彬现象为视点 59

女性写作与性别叙事

一位现代女作家的诞生

——以凌叔华为视点 81

“女性的优美灵魂”

——论冰心文学形象的建构（1919—1949） 100

政权意志、民间伦理与妇女翻身

——以赵树理小说《孟祥英翻身》、《传家宝》为讨论中心 117

仁义叙事的难度与难局

——铁凝论 131

社会性别意识的彰显

——论新世纪女性写作十年 155

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写作的实践

毕飞宇：作为“记忆”生产者的作家 181

对“全球化”生活的凝视与反省

——重读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 195

日常的尊严

——《推拿》的叙事伦理 203

论毕飞宇，兼及一种新现实主义写作的实践 219

新作家崛起

异乡人

——魏微论 241

看吧，这“非常态”书写

——陈希我论 260

取景器的内与外

——鲁敏论 273

“这一个”青春黑暗又明亮

——读冯唐 289

附录：

刹那即永远

——纪念萧红百年 303

后记 318

文学叙事与文化语境

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①

文本是现世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事件，而且即使是在文本似乎否认这一点时，仍然是它们在其中被发现并得到释义的社会世态、人类生活和历史各阶段（moments）的一部分。

——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②

①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1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② 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第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两个“福贵”的文学启示

——以赵树理《福贵》和余华《活着》为视点

把赵树理与余华放在一起论述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它挑战我们的文学“常识”——看起来，赵树理与余华，无论是小说风格、文学追求以及个人道路都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也的确有将他们共同论述的必要：他们都拥有名叫“福贵”的主人公，两个福贵形象有很多相似性——他们都是农民身份，都有赌博、流浪、赤贫到走投无路的经历。

《福贵》是短篇小说，写于1946年。福贵小时候是好孩子，他精干、勤劳，为给病逝的母亲操办后事，福贵借了高利贷，为此做了地主家的长工，辛苦的劳作并未使他很快还完债，原来的三十块钱越变越多，“第四年便滚到九十多块钱了。十月里算账，连工钱带自己四亩地余下的粮食一同抵给老万还不够。”^①福贵日渐灰心。他赌博，做“王八”，小偷小摸，本族人和村里人以他为耻，福贵只好逃走。村子被“解放”后，他回到家乡，重新做了“新人”。小说结尾止于“刨穷根会”上福贵的控诉，他质问地主：“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看这个坏蛋责任应该谁负？”反诘式结尾引发深思：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政策使“鬼”变成“人”。《活着》写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是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富家子弟福贵由富贵走向赤贫的人生中所遇

^① 赵树理：《福贵》，收入《赵树理全集》（1），第18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以下《福贵》引文均出自此版本。

到的种种苦难，书写了一位中国农民既普通又传奇的一生，小说止于上世纪 80 年代，福贵和他的老牛依然坚忍生活。

以余华的阅读谱系，写作《活着》时他应该未曾看过赵树理的《福贵》，两个福贵的相似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可是，正是此中无意，才更值得分析与关注：在同一类型农民形象身上，赵树理和余华之间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颇有症候色彩的文本对话。在我的视野范围里，已经有两位学者注意到了两个“福贵”形象之间的“亲缘”关系。王德威先生在《当代小说二十家》中指出余华小说中福贵的遭遇是对赵树理福贵形象的“冷笑”。《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中，旷新年先生认为两个福贵形象是潜在的互文关系，“不论余华是否意识到，或许是否阅读过赵树理的这篇小说，赵树理的这篇小说都明显地构成了余华写作的一个背景和传统。”^①

受到前面两位学者的启发，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对两个福贵的文学现象作进一步的讨论：是什么导致赵树理与余华的福贵形象迥异，是什么使余华改写了福贵，进而完成了无论是其个人写作生涯还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偶然巧合中有没有“必然”——是什么使赵树理和余华在语言风格、叙述形态方面具有不易察觉的相似性？论文希冀从《福贵》与《活着》的互文关系入手，挖掘两个福贵现象后面隐藏的必然性和关联性，探究这两位作家在寻找写作的可能性——对民间资源 / 外来资源的汲取与化用方面所做出的某些示范工作及其意义。

历史处境与个人经验

“我们记得 40 年代的赵树理也曾写下一篇《福贵》的小说。那个故事中的福贵受尽旧社会的影响，偷鸡摸狗。革命到来，他终有了翻

^① 旷新年：《余华的小说》，收入《写在当代文学的边上》，第 127—128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

身重新做人的机会。而站在世纪末往回看,余华一辈作家要冷笑了。”^①这是王德威先生对于两个福贵的评述。可是,余华之所以能写出《活着》,并不只是余华的个人才能使然。使余华有能力并有勇气“冷笑”的是使他站在“世纪末回头看”的历史处境和个人经验。

《写在当代文学边上》认为《福贵》是一篇“明显为了配合政治宣传而写作的小说”,这样的判断并非毫无道理。但,在赵树理的农村生活中,“福贵”的遭遇不是个案。赵树理的本家兄弟各轮能干,可是没有地种,最后沦为小偷,被村里人唾弃,被族长打个半死然后拉到河滩上活埋。当年,有感于这位本家兄弟的际遇,赵树理曾经想过写《各轮正传》。20年后,赵树理回到家乡,又听说朋友冯福贵在坏名声中死去,尸体被草草埋葬。赵树理本人出身寒微。王春在《赵树理怎样成为作家的?》中提到赵树理的家境,“他家原先种着十来亩地,但地上都带着笼头,就是说指地举债,到期本利不齐,债主就要拿地管业。从有他到抗战开始的三十年里,他的家和他自己是一直呻吟在高利债主的重压下的。被债主扫地出门的威胁,他经过。不得已几乎卖掉妹妹的惨痛,他经过。大腊月天躲避债主的风寒,他受过。总而言之,他是穷人,他是穷人的儿子。”——回到历史语境会发现,在讲述1946年及此前中国农村人命运的《福贵》中,“土改政策使二流子变成了人”抑或“革命重新改造人”并不是空话,它包含的是赵树理、赵树理的朋友以及本家兄弟的真切人生经验,它们并不轻逸。

余华出生于1960年,“文革”开始时他是六岁的孩童,“文革”结束时,他已是十六岁的少年。他看到了“文革”之中和“文革”之后万千人民的命运,也看到了中国土地政策的变化以及农民与此相伴的戏剧人生。所以,余华笔下福贵的人生是另一种曲折——福贵因赌博

^① 王德威:《伤痕即景,暴力奇观——余华论》,收入《当代小说二十家》,第14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一夜之间成为赤贫，他气死父亲，被高利贷压迫而离乡背井，他的母亲、儿子、女儿、外孙、朋友、敌人、妻子，一个个离奇地以各种方式死亡——福贵以他大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讲述了“活着”本身的意义。

应该想象一下两位作家面对各自福贵命运时的感受。当赵树理书写福贵时，他亲眼看到了穷人在一夜之间有了土地并成为了受人尊重的人的社会现实，他的内心有可能是激动的，45年后，当余华书写同样叫作福贵的农民的一生时，整个中国大陆已经经历了土改、合作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下的土地承包……余华把福贵的一生总结为“熬着”，这说法暴露了他内心里的感慨。换言之，1946年的赵树理书写的是他眼见的解放区农民因土地而改变命运的历史，而1991年的余华书写的也是他本人亲眼所见（而赵树理并没有亲见和亲历）的“福贵”的余生。如果早出生45年，余华在1946年是否能写出《活着》，如果晚出生45年，赵树理在1991年会不会书写《福贵》？这是个伪命题。但这样的发问将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历史处境对一位小说家创作的深刻影响——赵树理在“文革”时代被打倒、含冤而死，他再也没有能力看到他身后发生的沧桑巨变。

任何一位优秀小说家的经典之作都是站在前辈写作基础之上写就的，也与前辈作品隐秘地构成对话。作为小说家的赵树理和余华只是各自以忠实内心的方式完成了他们之于中国历史/农民际遇的见证与认识。正是因为有了前面诸多或叫“福贵”或不叫“福贵”的农民形象的存在，《活着》才深刻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来——无论如何，余华版“福贵”都不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我们”与“我：共同体想象与个体体认

“我赌博因为饿肚，我做贼也是因为饿肚，我当忘八还是因为饿肚！我饿肚是为什么啦？因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来块钱杂货，

怕还不了你，给你住了五年长工，没有抵得了这笔账，结果把四亩地缴给你，我才饿起肚来！我从二十九岁坏起，坏了六年，挨的打、受的气、流的泪、饿的肚，谁数得清呀？直到今年，大家还说我是坏人，躲着我走，叫我的孩子是‘忘八羔子’，这都是你老人家的恩典呀！”——《福贵》中，好孩子变成王八的原因在于那无穷无尽、无法偿还的高利贷。这正是小说的目的之一：“作者让人们看到了过去的社会中使贫苦农民们生活不下去的除了葬送生命之外别无出路的‘社会骗局’和‘阴险圈套’。”^①赵树理以福贵书写了“我们穷人”之于“苦难”的控诉者和讨伐者形象，这也是一个时代之于苦难的态度与理解。

在《福贵》中，为“活着”做的事情：小偷小摸、赌博、埋死去的孩子、在葬礼上做吹鼓手……在福贵、村人、族人本家那里被视作“王八”行径，是福贵被人抽打、他被认为（也自认为）低人一等的原由。但是，埋葬死去的孩子赚钱以及在葬礼上做吹鼓手并不和赌博、偷盗属于同一性质。此间的“善恶”实在需要辨析。因而，小说最后福贵的质问中，使人变成“坏蛋”的责任不能由一个人来负——使福贵变成“王八”的因素既包括高利贷的压迫，也应该包括村人和族人的愚昧与守旧。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赵树理强调了书写《福贵》的反封建立场：“那时，我们有些基层干部，尚有些残存的封建观念，对一些过去极端贫穷、做过一些被地主阶级认为是下等事的人（如送过死孩子、当过吹鼓手、抬过轿等），不但不尊重，而且有点怕玷污自己的身份，所以写这一篇，以打通其思想”。^②可是小说文本中，叙述人在寻找是谁使福贵变坏的原因时态度是暧昧的——他没有像小说作

① 洲之内彻：《赵树理文学的特色》，收入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乙种），第45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以下《赵树理研究资料》引用资料均出自此版本。

② 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收入《赵树理文集》（4），第3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者赵树理那样把目标指向当时的封建观念，相反，人物福贵的“控诉”声音强大到把叙述人的声音“掩盖”了。换言之，在控诉非人际遇时，福贵将旧有道德的迫害作为了对老万控诉的“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叙述人对此也给予默认。“封建观念”是复杂的，有风俗的形成，有地主阶级的原因，也以普通农民和大众的共同认识为基础。面对村子里弥漫的封建思想，干部的思想需要打通，“我们”和“我”不也应该检讨吗？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小说中福贵对地主的声讨出现了“不和谐”，这使叙述人在文本中的态度变得犹疑。

“不和谐”是由于写作者赵树理受到了“我们”的叙述视角的限制。茅盾说，“作者是站在人民立场写这题材的，他的爱憎分明，情绪热烈，他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是旁观者……”^①周扬则说，“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们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受，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②站在人民/农民/群众/集体的立场是赵的小说之所以受到广大农民欢迎的原因。正是这种把“自己”放置于“我们村”中的书写，成就了一种融入群众的叙述风格和一种“我们”的叙述策略。在我的理解中，此中的“我们”，具体而言不是赵树理在创作谈中指的“我们有些基层干部”中的“我们”，更确切地是指“他们”——那些喜欢阅读倾听赵树理小说的农民们。赵树理以使“我”融入“他们”的方式创造了“我们”，进而，“赵树理小说创造了一种更能为农民接受的阅读方式和调动其‘共同体’想象的文化接受方式。”^③

使农民接受和认同，意味着对大多数群众的认识、看法与观念要

① 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收入《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93页。

②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收入《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84页。

③ 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第35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有所迁就，就《福贵》而言，在面对隐蔽的旧的思想及风俗时，小说失去了应有的复杂与尖锐。这在赵的其他小说中也存在。《小二黑结婚》中，以大众和村人的观点去看待老年后依然喜欢打扮的三仙姑，她是可笑的小丑。村人们的哄笑是当时社会气氛的写照，但叙述人或作家本人也没有“异议”却不应该。这站在“群体”立场对个体者的嘲笑，使《小二黑结婚》最终没有能呈现出伟大作品的光泽。代“我们”立言的同时，赵树理作品显示了他的“时代性”，他“是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①只是，这样的书写方式是双刃剑——当他把“我”还原于“他们”，使用与“他们”一起看世界的方式书写时，遗失的是对中国农民内部复杂性的认知，遗失的是对农民身上守旧一面的批判（或批判的力度不够）。

余华不是站在农民内部写作的作家。他不进入“群体”，也不迁就任何人，他只是“旁观者”。在《活着》及《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之于苦难的书写需要琢磨——余华没有强烈的带入感，人物与时代环境的关系若即若离。郜元宝在分析余华的苦难意识时认为，余华是将主体的苦难意识融入了本原的未经知性和习俗道德分离的“身在其中”的情感和存在状况，融入了不特别张扬苦难意识但无疑把苦难意识和苦难情感涵摄其中的存在意识，融入了“活着”这种最直接最朴素的生存感受。^②余华阐述过他眼中的苦难书写：“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写《活着》，就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③这是余华与赵树理在苦难理解上的巨大的差异。这最终体现在两个福贵对于

① 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收入《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90页。

②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③ 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